

一九五九年，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

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

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

發揮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為世界和平事業，

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

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

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

發揮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為世界和平事業，

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

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

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

發揮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為世界和平事業，

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

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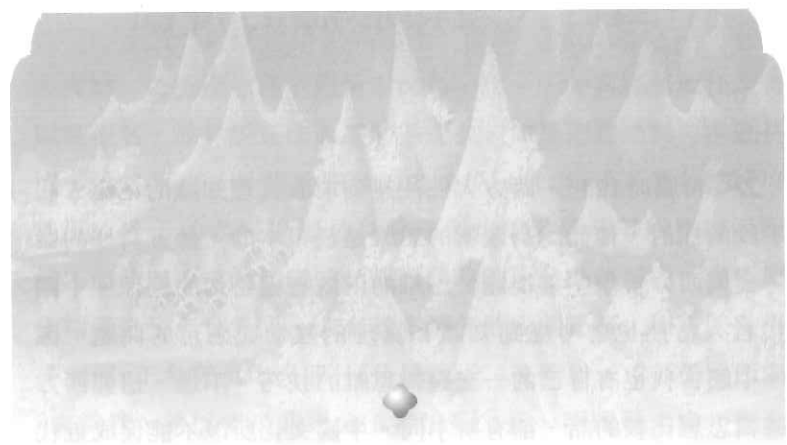
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

發揮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為世界和平事業，

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科技藝術篇

中國古代邏輯思想的特性

從希臘時代起，西方人便注意到求取真理知識的正確方法和手段的探討，他們認為邏輯的思維是最根本的。西方科學的發達，實與西方哲學中重視邏輯思維的傳統有極密切的關係。中國古代哲人當然也曾考慮到知識和真理的建立與應用的問題；因此，中國古代也有自己的一套邏輯思維的技巧。不過，這與西方的邏輯思想比較的話，卻有所不同。中國文化所以不能促成近代科學的產生，也許可從這裏知道一些端倪。

對中國邏輯思想的發展有較大貢獻的，從先秦時代起，大致可分為兩大流派。一派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為代表的正名派；另一派以惠施、公孫龍和墨家為代表的辯學派。兩派都重視思維的合理性與推論的真實性，並發展了自己的一套邏輯思維理論。前者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倫理的邏輯，而後者純知識思辯的色彩比較濃。不過，它們都有一共同點，即它們的邏輯論證系統是以解決具體問題為中心任務，和當時的現實社會生活有密切的聯繫。但對於抽象的邏輯思維本身的獨立價值，及其如何建立知識與真理的思考法則的問題，卻不重視。中國先秦時代的名辯（邏輯）學，主要屬於認識論的範疇，重視名辯技巧對社會、政治、教化、倫理等各項事務問題的解決，重視為現實生活服務，所以在形態上不是以思維法則為主題的純粹邏輯學。所謂純粹邏輯是指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式的形式邏輯；至於把中國的名辯學稱為認識論邏輯或應用邏輯似更恰當。

孔子把「正名」看作為政的手段，他說：「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

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罕》）荀子把孔子的正名思想發揮得更加透徹，他說：「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辯，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為一焉。……其民莫敢托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荀子·正名篇》）可見孔子、荀子的名辯思想是為建立理想的政治和等級秩序而服務的，而非以追求純知識的價值而服務的。此外公孫龍、惠施與墨家辯者之辨名實異同，雖有較多抽象的形式思維，但着眼點仍在於如何「正名實而化天下」（《公孫龍子·迹府》），或如墨家所倡的「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墨子·小取篇》）六種社會效益的達成。可見中國古代的邏輯思維，是不能脫離社會政治生活的實踐而有本身的獨立性的。

此外，判別真理是非的準繩方面，中國的名辯之學也有異於西方一般的邏輯法則。墨者認為「當」是辨別真理是非的準繩，有說：「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墨子·經說下》）但提到如何辨明「當」或「不當」的問題，墨子就用了「三表」或「三法」來作為判定的依據。《墨子·非命篇》說：「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国家百姓之利。」意思是說，判斷一種命題或知識的是非真假，第一要看它是否以歷史上聖王的經驗為依據；第二要看它是否根據現在羣眾耳聞目見的經驗；第三要把這種學說付諸實施，看它的社會效果如何，是否對國家人民有利。

可是，在判定命題和知識的真實與虛妄的問題上，從古希臘時代開始的西方哲學家所採的標準與方法就與先秦中國學者很不相同。古希臘的哲學家大多具有唯理論的傾向，相信只有通過理

性認識才能得到智慧、把握真理；他們不信任由觀察和感官得來的知識。例如：蘇格拉底指出靠感官來了解事物，會使我們的靈魂變瞎了。認為只有依靠理性才能得到永恆不變的知識。柏拉圖提出了理念論，認為理念是唯一真實的存在，是真善美的統一，個別事物只是其摹倣和影子；他認為有兩個世界存在，即理念世界和事物世界，從後者只能得到意見，從前者才能認識真理。故此，追求真理要從理型和概念的探索入手，而不是從個別具體事物或現象印證入手。此與上述墨者對待知識的態度是何等的不同。

這種輕視感官，推崇理性，着重形式抽象的思維傳統是西方思想的特點。這種傳統使得理性成為邏輯的標準，也使得亞里士多德創立的以形式邏輯推論真理的思想方法成為西方邏輯思想的主流。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是致力建立一套推理的形式結構，藉此以獲得真理知識。他認為任何真的命題都必須經過一定的邏輯推理才成立，而命題正確與否，則要看它是否滿足兩個條件：一、產生這個命題的前提必須是真的；二、產生這個命題的推論形式必須正確。科學的真理知識應該是根據真實的、第一性的、直接的、較熟悉的和先在的命題，並根據必然原因而得出的結論所建立起來的。

有了真的前提和合理的推理形式結構，就可以得到正確的結論，這是古希臘哲學家所深信的一種純粹理性的思辯方式。而中國先秦的學者，在推論真理時則要求是否能符合「明是非、審治亂、處利害、決嫌疑」等社會政治功效，是一種實踐理性的思辯方式。兩者是何等的涇渭分明。

探討中西古代哲學家如何判定知識真偽的標準和手段，可以看出中西邏輯思想的異趣。先秦名辯之學判定真理的準則往往是綜合型的、實用型的，與實踐理性密切相關。古希臘的邏輯學判

定真理的準則往往是單一型的、理智型的，是一種純粹理性。這一基本的分歧決定了日後中西方在科學發展的進程與方向上有重大的差距。本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曾指出：「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那就是：希臘哲學發明形式邏輯體系，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這兩種傳統都是中國文化中所欠缺的。

（林啟彥）

傳統儒家的知識觀

西方哲學以討論知識問題為主，中國哲學以探討人生問題為重。希臘哲學家認為知識就是道德，中國哲學家認為道德價值遠在知識之上。二者對知識的取態的不同，影響了中西文化發展的方向。中國文化尚德而西方文化尚智，西方有較中國更為優越的科學成就，中國卻有較西方更為可觀的人生哲理及倫理學說。

古代中國人對知識的態度，是先要看知識對實踐善良行為的價值而定取捨、別輕重。這方面的見解最能從儒家的學說中看出來。例如孔子學生樊遲問孔子何謂知(知識、智慧之義)，對此，孔子的回答是「知人」(認識人的價值、人的德性)。在另一處，孔子回答同樣的問題時又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意思是說知識要以謀求人民合理之事為先務，而不應追求一些無法有明確真相的知識。尊敬鬼神是可以的，但不應以不知為知，陷溺於鬼神迷信之事。孔子對於知識，保留一貫謹慎的態度，他並非必然反對人們對自然界萬事萬物好奇的求索，但他所最關心的是這些知識對人倫社會的維持是否有正面的價值。孔子對學生樊遲請教園藝農耕的技術知識時的回應，最能看出孔子對知識的態度。他認為這些知識與技藝的掌握與個人的道德修養關係不大，也對治理國家事務無大裨益，而真正擁有知識的統治者更需要追求的是修己治人的道理，這是信、義與禮。

荀子在儒家學者之中，是比較重視對客觀事物的認識與學習的。他反對迷信天命，主張認識自然規律，從而利用自然以造福人羣。他雖然明白指出人人皆有認識事物的能力，所謂「凡以知，人之性也」，也強調事物本身存在可認識的客觀規律與道

理，所謂「可以知，物之理也」；但荀子所要追求的經驗知識仍是為求倫理秩序的合理化為根本考慮的，他並無對經驗知識本身存在的客觀價值有任何的興趣。他沒有西方哲學家「為真理而真理」、「為知識而知識」的虔誠心態。他有正名的主張，似乎相當重視事實與概念的一致，這甚符合科學精神，但正名的目的在「上以明貴賤，下以辨異同」，仍是孔子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反映着倫理關係的正名學說的延伸。他對自然事物之辨異同，目的只在求其對倫理秩序的鞏固與維持的效用為何，因而也反對純知識的追求和概念上的無謂爭辯。

先秦儒家學者這種輕視由器物、技藝、概念思維及研究所得到的知識的傾向，發展到後代，就產生了宋明理學家所提出的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的分野。朱熹和陸九淵兩位理學家雖然在求學之道上有兩種不同的取徑：前者講道問學(從學習人倫事理入手)而後者講尊德性(從立志為善做起)，但朱、陸乃至所有宋明的理學家，大抵都甚為輕視自然界及生活範圍內的器物技藝知識的探求。朱熹認為道德修養的學問的追求，才是人生唯一的意義和目標。他曾說過：「如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成其飯也。」王陽明甚至認為「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

儒家這種以修身為本的致知態度，是無法對自然萬物性質與規律展開客觀的探討和研究，從而建立獨立的和有系統的科學知識的。

(林啟彥)

近代科學為何未能在中國興起

毛子水在《中國科學思想》一文中指出中國人有研究科學的才具，又舉出不少例證說明古代中國人的科技發現與成就，即使與同期或稍後的西方社會的成績比較，亦不遑多讓。他認為中國科學與技術的落後，只是近數百年的事。他相信中國人絕對有能力追上近代西方先進科學的水平。中國之不能成為近代科學發達國家，不是做不到的問題，而是未有做的問題。

毛氏因而進一步提出中國科學不發達的原因，純粹是由外緣因素所造成，這些外緣因素包括了以下數點：一、中國政治上長時期是大一統的天下，人民因襲故常，缺乏創新競爭之心，尤其不好追求奇技淫巧的玩意；二、傳統中國基本上是一個農業社會，人民知足常樂，並不鼓勵物質享受，而科技發達正為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三、中國科舉考試制度只重視選拔官吏而不重視培育學者，尤其不重視考取有科技知識的學者；四、中國古代的學校所教授者，全為倫理和政治方面的學問，亦缺乏一些專業的學會組織，不像西方的大學和學會，有長遠講授科技知識的傳統，因而不能培育科技人才；五、由於中國過去的經濟發展，長期處於穩定甚至停滯的狀態，故對科學與技藝的求精與進步，並無實際的需求，亦無促進的作用。毛氏相信，只要這些外緣的因素一一消失，中國人的科學成就必不難趕上西方。

毛氏就傳統中國不能產生近代科學的原因所作的這番解釋，固有其值得參考之處，但所舉的外緣因素，事實上也不能完全解答上述的問題。據近代學者金觀濤、樊洪業、劉青峯所撰寫的《文化背景與科學技術結構的演變》（收入《科學傳統與文化》一書）

一文中所提供的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水平增長曲線圖顯示，中國古代科技發達時代曾有三個高峯期，第一個高峯期在西漢至東漢年間，第二個在北宋至南宋間，第三個在明代。這三個歷史時代，基本上都是大一統的帝國，也都是儒學或理學昌盛的時代，儒學不鼓勵追求物欲享受，主張安貧樂道早已為學界的定論。宋明兩代科舉考試較諸唐代更不重視明算明曆等有關自然科學的知識，而兩代的科技成就仍較唐代為優勝，因此毛氏的解釋似還不能令人信服。其實，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自有其本身的軌迹，而其成就與局限，也因其本身的文化與社會的特性所使然。

要探求近代科學未能產生於中國的原因，筆者認為《中國科技史》的作者李約瑟博士的見解始終是最值得重視的。簡單來說，李氏指出中國不能產生近代科學的最主要的外在原因，是中國不能結束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形態而踏入一個資本主義的時代，而資本主義社會卻是近代科學的溫床。這就造成了傳統中國科技儘管在若干方面遠較西歐為進步，但亦不能向近代科學轉型。其次中國本身文化和學術思想的獨特性，亦妨礙中國傳統科技向近代科學的突破。西方文化中的希臘文化傳統和基督教文化傳統是中國所缺的。希臘文化傳統對宇宙和自然是充滿好奇和想像的，因而要對宇宙和自然視作一客觀的實體進行考察研究，從而發現和掌握其運作的法則與規律；而中國文化則視自然和宇宙為一生養萬物的有機體，人不要戰勝或征服自然，而要尋求與自然和諧無間的結合，到達一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融洽境界。故此視個人的德性修養遠重於智性的成就。此外，中國文化只有祖先崇拜而缺乏創造主的宗教信仰，中國人對宇宙和生命的來源問題，從來不感興趣，不像基督教文化之熱衷於對宇宙和人類始源的討論。西方文化正因為有基督教的傳統，從而為近代科學所要解決的宇宙起源、人類誕生以及要發展一套機械的

自然律來取代上帝的巧妙安排等科學上重大問題，提供了思維的基礎。

隨着中國社會性質的急劇蛻變，以及中西文化相互接觸和滲透的加速，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發展，已逐漸脫離傳統中國的模式而取型於西方，一切近代西歐社會所具備以促成近代科學發達的內外條件，亦終會在中國社會出現，則中國近代科學的輝煌前景，是可以預期的。

(林啟彥)

四大發明的歷史意義

指南針、火藥、造紙術和活字印刷並稱為中國之四大發明，反映和代表了中國古代的科技智慧及輝煌的文化成就。

指南針的發明和應用，歷史悠久，相傳黃帝征戰蚩尤的時代，黃帝就是利用了指南車來辨別方向。戰國時期的「司南」是指南車進一步的演進。司南是磨製成湯勺形狀的天然磁石，將此磁勺放在平滑的銅製地盤上，靜止時勺柄是會正確地指向南面的。東漢初年，王充在他所著的《論衡·是應篇》中提到：「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可見在當時磁針的指極性已很準確，而且已為大眾所公認。北宋時代，磁勺磨成細小的磁針，而且以「水浮法」、「碗唇旋定法」、「指甲旋定法」和「懸掛法」等四種裝置方法來安裝，用法簡便。北宋末年，指南針已普遍應用於航海事業上。朱彥在他的《萍洲可談》一書中提到他曾在廣州看見「舟師」們「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以確定航向。這個指南針導航的記錄，可說是世界航海史上使用指南針的最早記錄。其後，指南針傳至波斯、阿拉伯及歐洲英國等地，大大推進了近代的航海事業。譬如說，十五、六世紀葡萄牙人的環繞非洲，哥倫布的發現新大陸及麥哲倫的環球航行，若不是得到指南針的使用，是難以成功的。

火藥的發明據說是由煉丹而來的，但對火藥配方及其性質的記述，則遲至唐代時才有。唐代煉丹師孫思邈在《丹經要訣》中最早記錄了火藥的配方（把硫磺、硝、木炭製成藥粉，用來發火煉丹）。北宋曾公亮更把改良了的火藥配方記載於其《武經總要》中，據曾氏所載，唐代已出現了各式各樣的火藥武器了，如火

中國古代科學成就略說

英國學者李約瑟在他窮三十年時間對中國科技的研究中，論證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有很高的成果，奠定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在整個文明史上的地位。據李氏的研究，中國科學在古代的成就，可見下列例證：

(一) 數學方面：中國對於「數」的知識，比印度和阿拉伯還要早。著名的科學家南齊人祖沖之計算得圓周率 $(3.1415926 < \pi < 3.1415927)$ 及圓周的密率 $(355/113)$ 。歐洲要到一千年以後才能夠達到這個水平。又宋代人楊輝發明三角形的應用數學，在這方面的成就比歐洲早出四百多年。

(二) 曆法方面：元代科學家郭守敬於 1280 年製成舉世聞名的「授時曆」，精確計算出每年為 365.2425 日，是世界古曆法史上最早而又最精確的曆法之一。其實，中國自商周以來，已有完備而系統的曆法，以輔助農事的耕作。

(三) 天文學：唐代天文學家僧一行組織和領導了全國十二個點對北極高度和日影長短的測量，並計算出相當於子午線一度的長度，比歐洲於 814 年最早實測子午線早 90 年。其實，天文學是中國古代科學中最為發達的學科之一，中國早已擁有世界上最全面的天文記錄，其中包括日食、月食、彗星等。我們今天到北京旅遊，可參觀北京的天文館，即可看到這些紀錄儀器。

(四) 醫學：中國漢代已有醫書如「本草」類專教授人們使用中藥養生治療之道。明代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開列藥種已達千餘種。三國時的華佗，更精於外科手術。宋代的錢乙撰，專業兒科醫術，並編寫兒科專書。

砲，火箭等。至宋代，更出現了「霹靂砲」、「管形火器」等。蒙古人在對宋、金作戰時學到了製造火藥，並大規模地在戰爭中利用火藥武器對付中亞、西亞和回教國家。歐洲人於十三世紀後期，從阿拉伯文的書籍中獲得了火藥的知識。到了十四世紀前期，又從對回教國家的戰爭中學到了製造和使用火器的方法。

造紙術的起源亦很早，據近代考古證明，早在公元前二世紀的西漢時期，已經有用絲絮和大麻等植物纖維製造的紙張。由絲絮製的紙叫「絮紙」，因此紙字從糸，這是造紙術的開端。東漢時，蔡倫改用樹皮、麻頭、破布、漁網等原料製紙，改良了製紙的技術。造紙術的發明，推進了人類的學識，豐富了文化的業績，是世界上最大貢獻的發明之一。公元六世紀開始，中國的造紙技術，便由朝鮮、日本等地相繼傳入印度、阿拉伯及歐洲。

印刷術也是一項偉大發明。最初的雕版印刷是在印章和碑拓的基礎上產生的。唐代的雕版印刷已很普遍。唐咸通九年(公元 868 年)雕版印刷的《金剛經》是世界上目前發現的最早印刷品。北宋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他用膠泥刻製單字，然後燒硬這些單字作活字用，再按照需要把活字排在鐵框板上進行印刷，這就開始了活字排版印刷。以後又有進一步的改良，使用錫、銅等金屬製成活字，就更加堅固了。這種雕版活字印刷術，不久就傳到了朝鮮、日本、越南等鄰近國家，到了十五世紀中葉，就傳到了歐洲。

中國這四大發明，不僅標誌着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昌盛，而且影響着整個世界人類文明的發展。不容諱言的，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科學文化、生產技術和社會改革，主要是由於這四大發明的傳入而啟發的。研究中國科技史的李約瑟教授指出：「要是沒有這些貢獻，就不可能有我們西方文明的整個發展歷程。因為如果沒有火藥、紙、印刷術和磁針，歐洲封建主義的消失就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

(黃嫣梨)

中國人與自然觀

(五) 地理學：明代地理學家徐霞客在其所著的遊記中，對中國某些地區的考察，如西南地區石灰岩熔蝕地貌的考察，其應用之方法及知識，約於二百年後才被歐洲取用。

(六) 物理學：中國對磁石及鐵器的使用，早於春秋戰國時已頗普遍，並懂得利用磁石製作指向儀器「司南」，宋代更將之改良成指南針，對航海事業影響重大。

(七) 化學：煉丹術早在中國春秋戰國時已盛行，東漢煉丹家魏伯陽著有《周易參同契》，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本煉金術書。唐初名醫孫思邈更以新配方，利用硫磺、木炭等藥粉製造火藥。

(八) 建築及機械之製造：隋代工匠李春於河北趙縣浚河上建築的拱橋，可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敞肩橋」。東漢張衡創造的「水運渾天儀」，也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轉動的機械，此外，張氏發明的「地動儀」，更是流傳千古。

(九) 瓷器藝術：瓷器的製造，不僅表現中國先民的藝術水平，更從其製作技術如火溫等中可見中國人早已對化學有很高的認識。

此外，中國人對冶金、冶鐵、農業、造船業等，亦有高度的發展，成就是高於同期的西方的。

(黃嫣梨)

在中國傳統的人與自然關係的建構中，可見出中國人對自然抱持的態度，大抵可分為三個類型：一是以《周易大傳》為代表的天人協調說，二是以老莊為代表的服從自然說，三是以荀子為代表的征服自然說。這三說以「天人協調說」對中國人的自然觀影響最為巨大。幾千年來，中國人均以「適應自然」為其處世處事的思想主導，並因而開出了「天人合一」、「天人相應」等觀念，中國人認為人與自然可以相感相通，和諧相處。

《周易大傳·泰卦象傳》說：「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這裏的財，假借作裁，乃指節制；輔，乃謂輔助補充。天地之道者，謂四時（冬寒、夏暑、春生、秋殺）之道，天地之宜者，謂天地所生之物各有其得宜之處。朱熹說：「財成以制其過，輔助以補其不及。」財成與輔相都是指對自然加以調整，使天人和協。易傳之《乾文言》又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是強調天人的協調一致，這與儒家思想如《中庸》所說的「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和孟子說的「親親、仁民、愛物」等觀念都是互相吻合的。韋政通在其《中國的智慧》裏說這種思想是「經由人的道德意志，把原始天神轉化為生德的天道，天道流行，就是德化流行。然後又肯定天道之善即人性之善的本源，程明道『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之說，就是繫於天人同德的基礎之上。如此，不但解脫了人對原始天神的恐懼之感，也消除天人之間的敵對意識，產生了人與自然相親相愛的新關係，瀰漫在傳統人日常生活中的那份愛物惜物之情，就是這種關係所生的效果。」事實上，中國人

儒、道二家的藝術觀

藝術是中國文化中成果十分豐碩的一部分，而且也是獨具一格的。韋政通認為中國傳統藝術精神有三項主要的特徵：一是藝術生活化、二是美即象徵善、三是不尚形似重傳神。要了解這些特徵的形成，當可從認識儒道二家的藝術觀入手。儒家學者重視藝術的教化功能，使藝術的欣賞和創作成為提升個人情感生活達致道德善境的步驟和過程。道家學者（尤其是莊子）則強調藝術的獨立價值，提倡人應該生活於至美至樂的藝術境界中。二者共同塑造了中國傳統藝術的主題內容和審美原則。

孔子曾說過：「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道、德、仁基本上屬於德性修養方面，人要先有修德的心理基礎，始可發展其藝術的才華。孔子以禮樂為教，禮屬於行為的規範節度，目的在於秩序；樂有助於情感的抒發宣洩，目的在求心理的平衡與和諧。故有云：「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人的文化生活，一方面需要有秩序，另一方面也需要在秩序內的諧和感覺。孔子主張：「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就是要以音樂教育作為人生德性和智性修養的完成過程。在孔子眼中，音樂與其他所有藝術一樣，都是藉以陶冶和塑造人的情性心靈，使其合於道德善行。樂因此便有好壞之分，而其好壞並不由於音樂本身內在的優劣標準而定，而是由於樂是否符合社會價值和道德規範而定。樂有淫樂、和樂之別；聲有正聲、姦聲之分。音樂作為藝術，本身並沒有美與不美的獨立價值。藝術的價值，只能以其內容的善與不善來定。孟子和荀子對藝術所持的觀點，亦不異於此。例如孟子曾說：「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與自然的這份「天人同體」之情，正好突出了中國人的仁厚的文化與和平的性格。

中國人的這種「自然觀」，對中國的藝術和文學，均有深遠的影響。由於中國人奉行天人合一，中國的藝術即表現在中國人對自然的直接體認與感悟上，而趨向於自然景物的人性化和感情化。就以繪畫來說，西洋繪畫大致不甚講究情趣，只重具體性與客觀性，死魚、爛蘋果、受刑者，統統入畫。中國畫則不然，中國畫最重情趣，也要氣韻。一樹一石，一花一鳥全都是情趣盎然，氣韻生動的，這是「民胞物與」精神的表現。再如建築方面，西方園林是現實的，所以人工化的擺設特別多，如噴泉、水池、雕塑等借以組成圖案式設計。中國園林則重自然的抒情寫意。人工布置雖也不少，但是，她盡量將人工化去接近自然。譬如在亭園中建人工的山，人工的樹，以求與眼前的山鳥樹木慢慢連合，造成天人合一的景致。

中國人的愛好自然，更表現在中國人的文學創作裏，中國的古典詩詞，無不深深的滲透着中國人「渾然與物同體」之思想，程明道詩說：「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正是此意。劉勰說中國之文人墨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可見中國人對萬物之觀賞都是情意合一，天人同體的。陶淵明、王維的田園詩，更是這方面的具體表現。

（黃嫣梨）